

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

刘新成 主编



王永平
著

从“天下”到“世界”： 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From "Tian Xia" to "World":

China and the World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

刘新成 主编



从“天下”到“世界”： 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From "Tian Xia" to "World":
China and the World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y*

王永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天下”到“世界”: 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 王永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2579 - 3

I. ①从… II. ①王…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外国—汉代②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外国—唐代 IV. ①K234.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713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新纹

责任编辑 郭新纹

特约编辑 丁玉英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84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
(项目批准号08JZD0037) 的成果之一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域外探索及其对世界的认知”
(项目编号: 11LSB013) 成果

总 序

刘新成

当前，受全球化、“文明冲突”以及国际争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文明和民族国家三者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联合国将 2001 年定为“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发布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宣言”。文明对话也好，保护文化多样性也好，其实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异同关系”问题：世界同一，而文明和国家各异，因此必须处理好“异”和“同”的关系。

西方的“异同观”曾颇为“直白”：以异化同，亦即以西方文明同化世界，这与西方传统有关。西方自古典时代起就自视甚高，自称文明民族的同时，将毗邻的波斯人和日耳曼人等称为野蛮人。柏拉图设计的国家体制号称体现“普遍理想”，罗马法则以标志“人类共识”的“自然法”冠名。基督教取代犹太教也具有用普世宗教替代民族宗教的性质。中世纪教会宣称，世间全部生命毫无例外地服从上帝意志，（信仰）异端即属异类。宗教改革后，西方新兴阶级又恃其财富自称“上帝的选民”，睥睨所有“现世生活中的失败者”。1548 年西班牙人胡安·金斯·德·塞普尔维达写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西方人的海外征服完全正义，因为在非正义君主统治下的印第安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欧洲人是来解放他们的。在这些人看来，欧洲的海外扩张乃勉为其难的“白人负担”。启蒙运动后，宗教说教不再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进步观和目的论，西方发展道路被说成人类发展必由之路，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再是类别之分，而是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西方对世界的同化理所当然，而且非西方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西方靠拢。总之，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长期的唯我独尊加上近代以来视简化为美德的科学思维习惯，已经把西方导向“政治学摩尼教陷阱”，在他们眼中，世界永远是“我方”与“对方”

对峙的世界。时至今日，虽然许多西方人对“西方中心论”已经有所警觉，但传统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仅从近年出版的中译西著《国富国穷》（〔美〕戴维·S. 兰德斯，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和《文明》（〔英〕尼尔·弗格森，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非西方世界，尽管如中国等有古代文明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不乏“求同存异”“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等思想，但这些思想一般仅就本族内部而言，与营造“世界秩序”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态度“看世界”。他们与世界“碰撞”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与被西方侵略的屈辱史连在一起的，他们从一开始认识世界，就陷于承认劣势又不甘于劣势，反感西方又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矛盾之中，“体用心态”并非中国专利。从中国的“师夷制夷”到日本的“西方技术加日本精神”，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到俄罗斯的民粹派，从沙特君主“要现代化，不要西化”的主张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语言不同，说法各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或运动后果也不尽一致，但都表达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定式”：在这个定式的一边是本土，另一边是西方。本土一方最初可能是某种文明，但随着时代进展越来越多指向民族国家。

有言道“读史使人明智”，但殊不知历史学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受时代局限的史学有时非但不能使人明智，反而会制造认识误区。西方的世界史学就曾经起过误导作用。西方“现代历史科学”源于19世纪末的兰克学派。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盛行，唯心史观大行其道。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理性发展史，但各民族理性发展不均衡，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精神，而理性发展到极致的民族精神（如日耳曼民族精神）则代表世界精神。按照这种历史观，只有理性民族才有历史可言（黑格尔认为东方民族尚未进入理性时代，所以没有历史），而世界历史就是理性民族史。黑格尔哲学中聚合不同民族精神而成的“想象世界”，在历史学演绎下成为以国家为本体的“历史世界”，这就意味着，西方历史学从一诞生就不承认“整体世界”的历史，而只承认“分割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世界”的历史。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所有人物、事件都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展开，国家之间彼此隔绝、互无联系，整体世界更无从谈起。这种“化整为零”的世界历史观凸显欧洲国家的理性先行者地位，与西方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相契合，与当时欧洲盛行的民族主义相呼应，

是一种地道的西方产品，但是伴随西方的海外扩张和“文化殖民”，其影响遍及全球。今天，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教育都采取本国史加外国史的模式，汤因比式的推崇民族文化纯洁性、视文化混杂为没落标志的“世界史”编纂方式在在留下痕迹，以至堆积国别、忽略整体成为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突出区别、淡化同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多是一个分裂乃至对立和冲突的世界。

然而，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的发展却与世界史学叙述的传统脉络背道而驰。国际交往空前频繁，人员、商品、资本空前流动，国际组织、跨国组织空前活跃，现代化过程固有的规律限制了文化孤立存在和自我维护的机会，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发展简化了文化互动过程，静态的文明差异逐渐淡化，全球化趋势有目共睹。人们正是在对当代特点的思考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中，产生了对传统世界历史观的怀疑。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他认为，人们的交往能力如同生产能力一样，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用共识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而且，只有这些学习过程才可能使新的生产力得到使用”。我国学者费孝通不失时机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观念具有了不同凡响的现代内涵。在国际史学界，布罗代尔、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或呼吁或力行，以宏观视野审视世界史，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各部之和加以考察，所谓“全球史观”一时蔚然成风。全球史观内容繁复，“互动说”是其核心理念之一。该学说认为，人类属于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依存的物种，而他们为获得地球有限的能量必然彼此竞争，因此各人类群体不得不认真体会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对合作与竞争理解最深入者通常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会，与他人、他者、他方共处与交流能力是导致人类整体成功生存与繁衍的力量；在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推动历史变化的车轮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因为这种接触引起双方重新思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令其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最初正是这类接触和反应导致文明的产生，此后文明之间或国际势力之间的互动乃是促成世界历史从文明的原初状态向当今状态演变的动力和基础，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互动说”容有不周之处，但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种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或许会带来新

的启发。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十余年来我们除译介全球史论著外，也尝试做些研究工作。2008年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该中心获得教育部资助，承担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重大攻关课题。本套丛书就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我们申请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有专家问我们：你们怎么解释世界历史上的冲突？强调“共生”是否掩盖了国际冲突？我们承认世界历史上冲突不断，并无掩盖之想。我们也不相信互联网理想主义者尼葛洛·庞蒂所说的，“互联网的普及将改变我们的国别概念，国家会像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转为气体那样蒸发掉”，而对于当前国际上有关淡化民族利益的政治图谋，我们也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这些研究在重现历史上曾经发生却在世界历史学中被忽略的和平共处现象的同时，并不回避冲突，只是把冲突放在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相遇、碰撞、交往、交流、互动、共处、互容、相融等诸多方面中间来呈现，避免唯冲突论。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公民”如何相处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文明冲突论”所引发的反响与争议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作者亨廷顿原书涉及的内容。如何认识所谓“全球社会”才是关键所在，杜维明先生说，当前，“从政治上和伦理上说，世界民族大家庭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超越出自我利益辞藻之上，重获世界相互依靠的精神”。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已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本套丛书倘能使读者对世界的同一性和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增加一点儿认识，我们就很满足了。

目 录

绪论	(1)
----------	-----

上编 汉唐时期的中国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第一章 中国中心观与自我中心意识:古代各文明对世界的 基本认识	(15)
--	------

第一节 天下观、华夷观与九州论:古代中国对世界的 基本认识	(15)
第二节 自我中心意识:古代其他文明对世界的基本认识	(18)
余 论	(24)

第二章 从“天下”到“世界”:汉代中国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26)
------------------------------------	------

第一节 域外探索与文明互动:张骞通西域与汉代中国对 世界认知范围的扩大	(26)
第二节 从中国到罗马:班超对西域的经营与汉朝对世界 认知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35)
第三节 自合浦到已程不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汉朝 对南海诸国的认知	(42)
第四节 中国与外国:汉朝认知世界的新视角	(50)
结 论	(59)

第三章 从“天下”到“世界”: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对 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61)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对域外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62)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中国对域外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72)
第三节	传统变革与外来挑战:中古时期中国对世界 认知观念的变化	(87)
小 结		(96)
第四章	先秦至汉唐时期的西极地理观	(99)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西极地理观:从东方到西方	(99)
第二节	汉晋南北朝时期的西极地理观:从条支到大秦	(110)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西极地理观:从大秦到拂菻	(121)
小 结		(131)
第五章	古代东方文献中关于世界诸王的论述	(132)
第一节	中国皇帝与阿拉伯商人的对话	(132)
第二节	关于对话内容的分析	(134)
第三节	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世界诸王的其他记载	(141)
第四节	中国、印度和中亚流传的“四天子说”	(148)
余 论		(153)
附录一	一位中国皇帝与阿拉伯商人的对话	(156)

下编 物种、技术和社会风俗、思想观念的交流与传播

第六章	汉唐外来文明中的驯象	(161)
第一节	远古时期中国大陆曾广泛分布有大象	(162)
第二节	汉唐时期中国境内大象分布区域	(164)
第三节	张骞“凿空”之后域外驯象的输入	(168)
第四节	唐代外来驯象的主要地区	(177)
第五节	外来驯象与唐代文明	(182)
小 结		(187)
第七章	“拂菻狗”东传:从拜占庭到中国 ——兼论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物种传播	(188)

第一节	“拂菻狗”的东传路线	(188)
第二节	“拂菻狗”源流	(192)
第三节	唐代图像资料中的“拂菻犬”	(194)
第四节	唐代诗文中的“獬豸”	(200)
余 论		(205)
第八章	马毬与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	(210)
第一节	马毬在古代中国的兴起	(211)
第二节	马球在中亚波斯、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	(214)
第三节	马球在南亚次大陆和吐蕃	(220)
第四节	马毬与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	(222)
小 结		(227)
第九章	从踏歌看唐代中外娱乐风俗	(228)
第一节	踏歌的起源及其在唐代的盛行	(228)
第二节	踏歌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	(234)
第三节	古代世界各地的踏歌风俗	(238)
第四节	踏歌的形式及其特点	(245)
第五节	踏歌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251)
小 结		(256)
第十章	从《嘉兴绳技》看唐代中印文化交流	(258)
第一节	嘉兴绳技：一场神奇的幻术表演	(258)
第二节	通天绳技：一种古老的印度幻术	(259)
第三节	天竺绳技在中国的流传	(261)
余 论		(266)
第十一章	王玄策使印与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	(267)
第一节	王玄策使印所见天竺幻术	(268)
第二节	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	(274)
小 结		(281)

第十二章 印度长生术与长生药的东传

——以唐初二帝服饵丹药为中心 (283)

第一节 唐太宗与那罗迺娑婆 (284)

第二节 唐高宗与卢迦逸多 (292)

第三节 印度长生药和长生术的东传 (297)

第四节 印度长生师入华 (308)

小 结 (314)

附录二 从“天下”到“世界”

——全球史观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应用 (316)

参考文献 (322)

后记 (357)

绪 论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的盛世，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全社会普遍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开拓进取精神，统治者积极鼓励和提倡对外开放，从而推动了对外探索热情的空前高涨。随着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滇缅印道和吐蕃—泥婆罗道的相继开辟，中国和域外世界展开了大规模、全方位的互动和交流。许多以往并不知晓或知之甚少的地区和国家，相继进入了中国的视野，这就使得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认识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华夷”、“天下”界限，开始具有了一种相对开放的“世界”意识。

一 研究意义与价值

在中国古代，关于“世界”的认识主要体现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那么究竟有没有产生和形成过“世界”意识呢？这却是一个令学术界非常纠结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古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世界”意识，这是因为“天下观”产生于中国古代的早期，它是以文化为本位，强调以华夏为中心，向边缘的“蛮、夷、戎、狄”扩散的差序格局，也可以称为“华夷秩序”。这种认识带有很强的想象成分和理想色彩，这和早期对域外的探索十分有限、对外交通还很不发达、各文明之间的互动尚未大规模开展有关，因此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显得非常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和萌芽“世界”意识。其实，早在战国时期，阴阳家的著名代表人物邹衍就曾经提出过一种“大九州”的理论，他认为：天下有九州，中国只是其中之一，称为“赤县神州”，九州之外还有大海环绕。这种说法与传统“天下观”相比，似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早期“世界”意识的萌芽。只不过这种对“世界”的认识还主要是以“想象”为出发点，而不是建立在对域外世界的广泛探索与认知的基础之

上的。从“天下”观念到“世界”意识的逐渐出现和形成,是汉唐时期中国对域外世界不断探索和认知的结果。所以,研究汉唐时期的域外探索,对于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从“天下”观念到“世界”意识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外关系”是汉唐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向来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然而,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传统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角度展开的,研究的重点也多侧重于中外文化交流,而对古代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的互动与共生关系关注不够。笔者试图从全球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在研究汉唐时期的域外探索与东西方文明互动与共生的基础之上,来解释中古时期的中国对“世界”的认知范围及其程度,以此来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是如何突破相对狭隘的传统“天下”观念,开始具有比较开放的“世界”意识的。

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古老的中华文明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早期中国曾经和古代希腊、罗马、阿拉伯、印度一样,都曾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环绕自己周边的都是落后的“蛮族”和“夷狄”。这种普遍存在于东西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反映了古代各文明对其他文明缺乏了解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肯定与放大。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积极对外开拓和进取,以开放的姿态探索和对待域外世界,了解到世界上除了以“中国”和“四夷”组成的“天下”之外,还有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外国”,从而扩大了对“世界”的认知程度,这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正在昂首阔步地登上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舞台。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是如何通过对域外区域的探索,从而引发了古代中国从“天下”到“世界”的了解与认知过程,这对当代中国客观地认识世界多元文明,从而为建立一种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平等相处、和谐共生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涉及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积淀非常深厚,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与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时期的中外文

化交流与中西交通史方面,尤其是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物质文化的交流、宗教和艺术文明的传播以及社会生活习俗的相互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

从近代以来,西方和日本的汉学家就开始了有关中外关系史和交通史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较著名的学者有:法国的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烈维(S. Levi)、伯希和(Paul Pelliot)、费琅(Gabriel Ferrand)、安田朴(Rene Etiemble)、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戴仁(Jean-Pierre Drège)、让-诺埃尔·罗伯特(Jean-Noel Robert)、鲁保罗(Jean-Paul Roux)等,英国的裕尔(H. Yule)、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G. F. 赫德逊(G. F. Hudson)、阿·克·穆尔(A. C. Moule)等,德国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等,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等,美国的劳费尔(B. Laufer)、谢弗(Edward Schafer)、梯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许多学者都有很好的论述。^①日本学者羽田亨、藤田丰八、白鸟库吉、桑原鹭藏、长泽俊和等也留下了不少

①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法]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法]烈维:《王玄策使印度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法]戴仁:《丝绸之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传奇》,吴岳添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法]让-诺埃尔·罗伯特:《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马军、宋敏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法]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版。[英]G. F.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李申、张毅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英]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蒋本良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德]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美]费雷德里克·J. 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丘进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精辟的论著。^①

中国学术界也非常关注汉唐对外关系史和交通史的研究,可谓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其中尤以冯承钧、张星烺、向达三位先生的成就最大。

冯承钧先生在中外交通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域地名》、《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等。另外,从1934年起,冯承钧先生还先后翻译出版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分别由商务印书馆(第1—4编)和中华书局(第5—9编)出版,对引进和介绍西方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②

张星烺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在中西交通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他所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共六册),早在1930年便已问世。该书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有关中西交通的史料按地区、年代先后进行汇辑,并加以详细注释和考订,创见甚多。由于该套书内容丰富,资料比较集中,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③

向达先生也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与交通史的著名学者,他的代表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等。^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初版于1933年,由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刊出,后于1957年收入他的同名论文集。该文从入华胡人及其所传来的音乐舞蹈、绘画、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唐代社会所受到的西域文明的影响。翌年,他又出版《中西交通史》,对古代中西交通的主要路线以及文化交流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他的成果受中外学界的

①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西北古地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日]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1、2辑),王鲁古译,商务印书馆1938、1940年版。[日]桑原鹭藏:《唐宋元代中西通商史》,冯攸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冯攸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日]长泽俊和:《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55年版;《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译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4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重印第1版、(第5—9编),中华书局1956—1958年版。

③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四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④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瞩目。

另外,陈垣、岑仲勉、齐思和、方豪、季羨林、饶宗颐、白寿彝、周一良、马雍、朱杰勤、阎宗临、陈竺同、章巽、陈炎、何芳川、张广达、姜伯勤、蔡鸿生、安作璋、林悟殊、余太山、陈佳荣、耿昇、王邦维、沈福伟、林梅村、张国刚、荣新江、王小甫、葛承雍、丘进、杨建新、卢苇、李明伟、黄盛璋、张维华、张绪山、石云涛、李志夫、马骏琪、王介南、李喜所、杨晓霁、彭小平、李云泉等人,^① 都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论述

①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回教入中国史略》,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季羨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第10册第7卷《中外关系史》,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芳川:《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与万明合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与王小甫合著),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与范恩实、宁永娟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版。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正》,中华书局2005年版;《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余太山:《嚙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年版。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见下页)